

我的**三农**印记

吴昭仁◎著

WODE
SANNONG
YINJI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本书受安徽大学农村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资助

我的三农印记

吴昭仁◎著

WODE

SANNONG

YINJI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三农印记/吴昭仁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7-5664-1290-4

I. ①我… II. ①吴… III. ①三农问题—安徽—文集 IV. ①F327.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1155 号

我的三农印记

Wode Sannong Yinji

吴昭仁 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40mm

印 张: 24.75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2.00 元

ISBN 978-7-5664-1290-4

策划编辑: 李 君 苏 昕

责任编辑: 苏 昕 李加凯

责任印制: 陈 如

装帧设计: 任志宏 张 浩

美术编辑: 李 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65106311

序 言

1977年11月,中共安徽省委颁布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拉开了安徽全域农村改革的序幕。发生在安徽大地上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这次改革的意义不亚于土地改革,它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1996年,中国粮食产量超过1万亿斤,棉花8400万担。粮食供给不足问题历史性地得到了解决。农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发端于安徽的农村改革迅速推广到城市,改革的中心也转移到了城市,从此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就在农村和城市各个领域展开,安徽农村改革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但这次农村改革是有局限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村社会面貌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民的身份待遇也并没有实质性改善。实际上,二元社会结构不打破,农民的地位就不可能提高。从8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经济社会改革的巨大成本,最后依然还是由农民来承担了。到1990年代中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出现了逆转;其主要表现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生产不景气;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土地撂荒现象严重。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乡镇政权开始重建,行政事业人员恶性膨胀,这种体制转轨的负担到最后也转移到了农民的身上,农民问题至此终于演变成为“三农”问题。

要透析三农问题,安徽是最好的活标本。这不仅因为安徽是农村改革的发祥地,而且也因为安徽在进行税费改革,探索农村综合改革上始终走在前

列。1993年,安徽省在太和、涡阳等地开始了农村税费改革的尝试,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这是对农村分配体制的又一次新的改革探索,为减轻农民负担起到了扬汤止沸的作用。2000年,安徽省被中央确定为全国唯一的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省,2001年全省农民共减轻政策性负担19.4亿元,加上减少“两工”负担,共减负45亿元,农民负担一举减轻31%。2005年初,安徽省出台了《关于开展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建立农村基层工作新机制的意见》,标志着安徽又掀起了农村改革的第三波浪潮——农村综合改革。这次改革的重点以“深化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为主轴、以“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建立农村基层管理新机制、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机制、建立‘三农’社会化服务体系、改进农村工作考核评价办法”为核心内容;并确定了18个试点县(市),强调以适用灵活的工作机制来进行农村综合改革。“第三波”改革的核心是尊重、激活农民伟大的创造性:鼓励农村“继续改革”,以破解税费改革后的“附生难题”;鼓励农民以提高组织化程度,来铸造新农村建设的“第三架马车”;鼓励更多的农村居民参与全民创业,使农村、农业、农民自身的内生力量得到发展壮大。相对于前两次农村经营体制和农村分配体制的改革而言,这一次的改革更有深度、广度、力度和难度,它的改革重点直指农村的上层建筑,用郭金龙同志的话说:“这是一场改革深水区的探索。”安徽再次走上农村改革新征程!

但三农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农民负担时有反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困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完善乃至深层次的综合体制改革不能到位等等,依旧困扰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此,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2006年2月,中央政府又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从此中国迎来了统筹城乡均衡发展的新时代!

在安徽历次农村改革中,吴昭仁先生都是亲历者、推动者,为农村改革与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谈到农村改

革时说：“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是立了功的”。对此，万里则说：“农村改革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支持和广大农民积极拥护外，还有一条就是得到一批政治思想强，理论水平高，真正了解实际，敢于讲真话，坚持真理，敢于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领导干部、理论家、科学家、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坚决支持”。在我的心目中，吴老就是这种“政治思想强，理论水平高，真正了解实际，敢于讲真话，坚持真理，敢于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领导干部”，是我敬重的前辈。值此农村改革开启四十年、阜阳农村改革试验区成立三十年之际，我们出版了吴老《我的三农印记》这本书，以期存留历史，激励后学！

是为序。

张德元

2016年12月

目 录

第一卷 叙述、议论

从我省粮食生产的起伏看极“左”的危害	3
王光宇陪同林乎加访问粮食大户吴凤启	9
正确对待当今农村能人	13
我对今日私营经济性质的看法	20
克服城市倾斜偏向 增强农民对话地位	23
从“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到“保障农民应有权益”	30
关于制止农民负担反弹的调研报告	33
土地是农民最主要财产	41
政府要引导和帮助农民适应市场经济	47
全面认识山区	55
漫议“建设美好乡村”	62
对农村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的几点建议	69
对农民一往情深的杜老	72
在光宇同志身边的日子	76
良师益友汪涉云	86
三农老友陆子修	91
为保荐责任田上书毛泽东的钱让能	97
《农民合法权益与保障》序	101

《金桥村的变迁》序	103
《阜阳地区土地二轮承包文集》序	106
《太和县农村税费改革资料汇编》序	109
下大功夫抓落实	112
荒山绿了也是愁	115
稳定才能出成果	118
农村工作仍是“重头戏”	120
农地制度改革的回顾及我见	122
我所亲历的安徽农村税费改革	135
农村发展的重中之重在于发展教育	144
对农民增收的看法、意见和建议	151

第二卷 汇报、发言

向宋平同志汇报农村个私经济	159
向姜春云同志汇报太和农村税改情况	163
向温家宝同志汇报农村改革和农民工受欺问题	165
向温家宝同志汇报我对安徽农村税改的看法和建议	169
关于水库移民后扶工作向国务院的汇报及批示(原稿)	173
向陈俊生同志汇报阜阳地区税费改革情况	178
关于阜阳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向中央农研室和省委领导的汇报	183
关于阜阳农村税费改革	189
在省委春节座谈会上反映农村干部苦衷	192

第三卷 讲课、演说

关于农村股份合作制问题在省委常委中心组的学习辅导	197
安徽农村改革现状及深化改革思路	206
在省委党校讲授农村要聚精会神发展经济	219

在安农大农经系讲授农村奔小康问题	226
关于农村“一个稳定增长,两个加快发展”在省委讲师团讲课	234
在省行政学院讲“走农村城镇化之路”	248
在安徽农经管理干部学院演讲“农村三个转化”	257
在省直党校讲关于农业产业化问题	261
关于“党在农村的三个基本政策”在部分省直机关和部分地市县三千人大会议上的演讲	273
在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典礼的学员代表发言:农民种粮积极性为何下降?	309
与地市农经委主任谈“讲真话”	313

第四卷 出访、借鉴

东欧剧变前的匈牙利农地制度:个人私有,集体经营	319
泰国的粮食市场、“公司加农户”和扶贫帮困	325
日本福冈县的农民协会	334
法国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	341
1987 年的罗马尼亚:不垮台才怪	348
访美见闻及随感	353
台湾的农会、合作社、产销班	367

附 录

作者简介	378
展 望	380

第一卷 叙述、议论

从我省粮食生产的起伏看极“左”的危害

建国三十年来,我省粮食生产明显有了一定的发展,1977 年比 1949 年增长了 1.34 倍。但是,这一时期却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起伏,增长进度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是什么原因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影响粮食生产的主要原因是“左”的干扰,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等带来的破坏。

(一)

1955 年以前,我省粮食生产稳步上升。除了 1954 年大水灾外,年年增产。1955 年比 1949 年增长了 81%,年递增率为 10.3%,平均每年增长 17 亿斤。增长速度如此之快,主要原因是这几年的政策正确且稳定,生产关系又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经过土改,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互助组、初级社符合农民的要求,且当时生产组织的规模及其管理方法同农民的觉悟程度、干部管理水平相适应,因而促进了生产力发展。1956 年以后,反右派、反右倾运动接踵而来,农村的生产组织变动频繁,“五风”盛行。有些生产改革(如“三改”),在今天看来虽然是正确的,但当时不顾主客观条件,强制推行,甚至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这反而造成了不良后果。这些都严重挫伤了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开始下降。到 1961 年,统计年报的粮食产量比 1955 年下降了 46%。过去人们往往用“三年自然灾害”来解释,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上,我省 1958 年农作物长势非常好,1960 年基本上风调雨顺,只是 1959 年旱灾较重。

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党内民主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调整了农村政策,批判并纠正了“五风”错误,把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下放到生产队,从而使生产有所恢复发展,其中1964、1965年连续两年粮食生产都比上一年增长20亿斤以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但1966年以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拼命鼓吹极左,给全党全国带来了巨大灾难。当时在我省农村“夺权”夺到生产队,到处搞撤区并社,到处搞大队核算,到处“割尾巴”、批“资本主义”。“杀一头老母猪就是杀掉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少养一只鸡就少了一分私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乱七八糟的口号震天价响。如果当时农民也像工人一样拿工资的话,很可能就没有人种田了。1969年粮食产量低到1965年以前的水平,比1955年下降18%。

1970年全国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虽然农业上“左”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由于会议重申了人民公社《六十条》的一些基本政策,对林彪、陈伯达、“四人帮”所鼓吹的假共产主义有所触动和抵制,使我省粮食生产水平出现第三次上升。经过15年的波折,1970年粮食产量超过了1955年的水平,1973年突破了300亿斤大关。但是,这种大好形势不久又被“四人帮”及其在我省的代理人破坏了。他们利用批林批孔,在干部中层层揪“民主派”、“走资派”,在农村大搞穷过渡、“浮夸”“瞎指挥”“高征购”,取缔集市贸易,限制家庭副业,没收自留地等。极“左”再次笼罩着全省农村,粮食生产出现了多年徘徊的局面。

(二)

在上述三次起伏中,其中第二、第三两次上升,是由于前一段下降幅度太大造成的,这个“起伏”是带有恢复性质的。由于当时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极左是主要症结,批得很不够狠,所以恢复的速度较慢,而且稍有恢复后,新的“左”的思想又抬起了头,再次造成危害。

纵观这三十年,以1955年以前的六年粮食生产状况为最好。当时社会农副产品丰富,价格便宜,农村生活好,工农差别小,招工、参军无需走后门,

有些青年还不愿离开农村。1955年以后,粮食生产处于下降、徘徊或者是恢复性回升的阶段,即便是发展,速度也是很慢的。1949年至1955年,粮食平均年增长17亿斤,而1956年至1977年,平均每年仅增长3亿斤,1970年以后,虽然粮食年产量超过了1955年,但按人口平均数来看始终没有达到1955年的水平。1977年与1955年相比,农业人口平均生产的粮食少了五十多斤,平均提供的商品粮少了一半,全省农村净征购量(扣除农村回销)减少了30%。

二十多年来影响我省粮食生产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运动太多,而且每次运动必反右,逼得人们越来越“左”。林彪、“四人帮”利用了人们的恐右心理,煽风点火,鼓吹极“左”思潮,使得“左”的危害越来越严重。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民主生活的非正常化,不仅造成了政治上的动乱,也把人的思想搞乱了,而且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有些人,见群众生活稍微好一点就眼红,门前多栽几棵树,家里多养几头猪,就当成“资本主义”,生产稍微有点发展,经济形势稍好一点就忘乎所以,又乱出新花样,直到把生产搞垮了,把群众生活搞苦了,再来“落实政策”。然后又按照这个公式循环,以致造成几起几落。农村经济政策也极不稳定,变来变去,今天大队核算,明天小队核算,后天又鼓吹“过渡”;今天给自留地,明天又收回,后天又以置换好;今天讲几定,明天又加超购,后天是越增产越加任务;等等,翻来覆去,失信于民,干群被弄得晕头转向,不知道党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直到今天,有些群众和基层干部对党的现行政策还半信半疑,害怕生产发展了,政策又有变化。极左的流毒实在是太深了。

(三)

粉碎了“四人帮”,中央又解决了安徽省委领导问题,为我省粮食生产的健康发展开辟了道路。1978年,我省遭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粮食产量仍接近常年水平;今年夏粮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在去年超历史的基础上又增产三成多,这是三十年来从没有过的。省委在狠批极左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

《六条规定》，特别是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的贯彻，并实行了多种形式联系产量责任制，因地因时制宜地进行了生产改革，丘陵地区水路不通走旱路等政策的实行是战胜灾害、获得丰收的主要原因。两年多的实践证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正确而又稳定的农村经济政策、按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这才是搞好粮食生产乃至整个农业生产的关键。

党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是在总结了三十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写出来的，具体体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路线。我能够领会到，中央决定的中心思想贯穿的是一个批左的精神。不把极“左”批透，党的政策就不能落实，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就调动不起来。一定要全面地、持久地贯彻落实这两个文件精神，使农村工作有一个章程可循。从我省农村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必须进一步搞好批“左”。为此我认为要注意解决五个问题。

一要认真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补课。当前在农村工作中，有不少同志思想很不解放，对党的现行政策将信将疑，执行起来摇摇晃晃。特别是对农村阶级、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等的看法，认识很不统一。据说原因之一是“过去被批怕了”。这就迫切要求深入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农村工作中“左”的倾向由来已久，林彪、“四人帮”把极“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给人们的毒害太深。对于过去被批判过的东西（包括文化大革命前批判的），都应拿实践经验进行检验，绝不能认为凡是受过批判的都是错误的。特别是后进社队，更应该用自身三十年的实践经验来分析并总结上得慢的原因和教训，不能受条条框框的束缚，不能再自欺欺人。只有让思想冲破了牢笼，批透极“左”，彻底摆脱僵化半僵化的状态，把思想路线搞端正，党的农村政策才能够完全得到贯彻落实，农业前进的步伐才能大大加快。

二是不要怕农民富。这要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农村工作的重要思想政策。应当明确，社会主义不是大家都过清贫生活，人民群众富裕起来不等于变成了资本主义。只要不分田单干，不放高利贷，不雇工剥削，不妨碍集体

生产，依靠正当的劳动收入，富就是合法的、光荣的。不要怕“冒尖”，更不能“眼红”。要允许一些生产经营搞得好的生产队，和一些劳动力强、劳动技能好、会当家理财的社员户先“冒尖”，逐步带动大家共同富裕。

三要承认落后的现状。小农经济的思想要批判，小农经济的管理方法要改革，但是，也要承认现状：我省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手工劳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机械化还不能立刻实现。在三年调整期间，要注意减轻农民负担，充实社队家底，让农民得以休养生息。进行生产规划，兴办各项建设事业，都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以节约民力。特别要搞好劳动计酬，来调动社员劳动积极性。计酬的形式，可以按定额记分，可以按时计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各个作业组，根据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对那些长期后进和居住分散的生产队，要允许群众把劳动组合搞小一点，实行分组作业，使生产效果与群众切身利益靠得更近。坚决批判和克服那种不顾条件越大越好的“大呼隆”思想。以增产、增收、增贡献为检验标准，群众愿意实行哪种办法就实行哪种办法，不要强求一律。

四是切实保障生产队的自主权。党和政府对农业的领导，主要是靠方针政策，发展农业科学事业，研究推广先进经验。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要允许社队因地制宜安排作物茬口。要相信农民会种田，相信农民要依靠种田吃饭，让他们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多少年来农民就在埋怨，种田的人没有权，掌权的人又不种田。好像只有书记一个人会种田，泡稻种、开秧门时间、甚至连一亩田栽多少棵，行距和棵距多大，都要书记开电话会议，那是典型的瞎指挥哟！在进行生产改革时，既要积极，又要稳重，坚持实验，坚持实践，切不可乱提不符合实际的极“左”口号。即使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先进办法，也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群众自觉地接受；在多数社员还不认识、不信任的情况下，不能强制推广。过去我们吃“一刀切”的亏太大了，今后要让生产队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各显神通，不要乱加干涉。

五要让农民有“小自由”。要尽快实现农业现代化，使我国富强起来，国家、集体、个人必须一齐上。国家要重点支持农业，但目前经济力量有限，不

可苛求,要把政治工作同经济工作结合去做,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搞好集体生产的前提下,经营好家庭副业。自留地、饲料地要按规定给足,对社员的正当家庭副业不要横加限制,积极支持集市贸易的正常发展。有些同志认为他们那里集体耕地少,怕给了自留地、饲料地会减少集体耕地,影响集体产量。我认为,集体耕地再少的县、社、队,自留地、饲料地也要按规定给足。应该承认,目前自留地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比集体耕地的产量要高得多,生产出来的产品都是物质财富,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有好处,有什么怕的呢?此外,农村也要按农事情况规定一定的休假日,特别是女社员,要让她们有处理家务的时间。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生活,只要是健康的,就应当给予支持,让群众有劳有逸。总之,要把事情搞活,不要限制太死,使得人人心情舒畅。

《安徽日报》1979年10月13日